

本期嘉宾



孙绍振 1936年生,祖籍福州长乐,著名文学评论家、教育家。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学院资深教授,曾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、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、福建省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。有专著《文学创作论》《论变异》《美的结构》《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》《孙绍振文集》等。

左海会客厅

孙绍振:“进攻者”的美学

本报记者 黄晓

推开福建师范大学教职工宿舍的房门,最先闯入视野的是满溢的书,从客厅地面摆到天花板,旧书的墨香混着老房的潮气。最新版的《孙绍振文集》被精心摆放在书架上,满满一排。

墙上,一幅装帧精美的肖像照格外惹眼。照片里的孙绍振身姿潇洒,带着几分随意,这是他在马祖岛旅游时粉丝

拍摄的。角落一幅涂鸦自画像露出来,上书一行字:“那个被谢冕认为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人”。

已经90岁的孙绍振坐在书堆间的藤椅上,鬓角染霜,说话时眼角细纹轻轻皱起。当记者让他用三个词形容自己,他一下坐直身子,舒缓的语调陡然清亮:“直率、透明、进攻!”

不愿被驯服的“孙猴子”



▲年轻时的孙绍振。

能完成三个星期的工作量,剩余时间就在书海遨游。

他的小屋里,一盏昏黄台灯是唯一光源,圈出一方小小的书桌。桌面上,厚厚的书和收音机撑起他的精神世界。

马克思、黑格尔的著作以及英文版《毛泽东选集》,边角被摩挲得卷曲发毛。但他觉得光看不行,还需要听,需要声音。他花了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收音机,金属天线伸得长长的,竭力捕捉飘荡在空气中的电波。他听中国之声,也偶尔转动旋钮,听听国外的频道,感受大千世界。

书籍连接着沉静的过去,收音机通往流动的未来。在那些孤独的夜晚,他的世界并不寂静——那里回荡着思考与对话的声音。十年后,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

有人说,那十年把他“养肥了”。“确实,没有事务缠身,没有论文压力,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记忆和理解都正处在顶峰,读了好多以后没有时间细读的书。那段被迫沉默的时光,反而成了我日后思想的沃土。”他很乐观地说。

那时的华侨大学没有校舍,也没有图书馆,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,但也没有压垮他。

在他看来,改作文很简单,他一天就



孙绍振(中)与青年学子交流。(福师大供图)

破茧而出的美学新见

20世纪80年代,刚兴起不久的朦胧诗遭遇了各方围攻,代表诗人舒婷等的作品被斥为“晦涩难懂”。彼时并不专攻诗论的孙绍振,敏锐地察觉到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。

“我看到了新的美学在萌动。”孙绍振回忆道,“那些诗不是‘毒草’,而是一种新的表达。”带着这一认知,他写下万字长文为朦胧诗辩护。令他没想到的是,这篇文章被《新华月报》转载,引发广泛关注。

后来在南宁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诗歌理论讨论会上,他更是“一炮而红”。“当天的会开得很沉闷,我也没有发表见解。”孙绍振说,最后一届《文学评论》主编张炯直言要求他提高音量“放一炮”,他本想保持“沉默是金”,但因为张炯和谢冕坚持让他发声,他提出一个条件——最后一个发言。

结果他一开口就点燃了会场:“你们看不懂朦胧诗,这难道是你们的光荣吗?看不懂你怎么引导人家?”孙绍振笑着说,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怼人。整个会场,年轻一派鼓掌,老一派瞪眼,“散会的时候,大家说不行,继续开会”。甚至还有老成持重的名诗人给谢冕写信,忠告他与孙绍振划清界限,遭到谢冕拒绝。

这之后,全国都开始讨论朦胧诗,孙绍振继续撰文阐述“喜闻乐见是积累的过程,不能因‘少闻少见’否定新形式”。在之后召开的多次诗歌研讨会上,他常作为主要辩手出

场,言辞犀利,但句句在理。

这样的“进攻”,从不是为了“赢”,而是为了让不同的声音争鸣。

面临压力他未曾退缩,在1981年发表了让他蜚声文坛的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》。他直言“传统是丰碑,也是保守的力量,因此思想解放运动都要对传统持一种亵渎”。谢冕劝他“‘亵渎’两个字会惹麻烦”,他却坚持己见:“新理论的出现总要打破旧传统,文学也一样。自然科学时代开始,从‘上帝创造地球’到‘地心说’,再到‘日心说’,那时候也是亵渎上帝。”

这话成了“导火索”。他的文章被《诗刊》批判,批判文章还被不少报纸转载。“本来《诗

刊》批判我还不怕,但报纸转载了,班上的学生都看了。”当天上午9点半他拿到报纸,10点就要上课,他硬着头皮走进教室,没想到学生们“唰”地全站起来鼓掌,还出了一份小的油印报,说“我们需要这样的老师”。后来他还收到几百封来信,全都是支持的声音。

“那时候年轻,不知天高地厚。回过头看,那场大批判反而意外地成就了我,成了文学史上一个节点。”1985年,经历了数年的沉寂,孙绍振依据自己对艺术规律的重新思考,在《文学评论》上发表了《文学形象的三维结构和作家的内在自由》一文,提出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。



孙绍振(中)和好友谢冕(左)、诗人艾青(右)一同交流。

敢闯的引路人

于孙绍振,“进攻”不只是横冲直撞的孤勇,也意味带着温度的探路——在没人走过的方向,踩出一条属于中国文学的路。

1973年孙绍振到福建师范大学工作,他被分到了中文系里最“冷门”的写作组,大家都戏称这儿是“西伯利亚”;没理论可讲,日常就是改改学生作文,带着学生去老区采访,最后凑本小书就算交差。1977级学生一来,规矩变了——要正经上“文学创作课”。领导拍板:“你会写诗,这课就归你了!”

但这门课处于“无大纲、无教材、无先例”的“三无”境地。当时能找到的资料,只有零散的基础写作,不但没有系统的理论,也没有对诗歌、散文等的论述,根本撑不起每周四节课,孙绍振就较上了劲:“那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,立意建构全世界还没有的文学创作理论。”

他抱着厚厚的笔记琢磨,从诗歌里的一句意境、小说里的一个细节入手,一点点攒讲稿。后来稿子打印出来,他试着投了一节到《春风》杂志,没成想很快就发表了,主编还专门来信说,“这本书得出版”。

更大的机遇还在后面。这套足足65万字、尚未出版,还是用大开本打印的讲义,被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抱到了北京解放军艺

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面前。徐怀中翻完那一大摞稿子,立刻说:“就请孙绍振来讲!”于是,孙绍振北上了,和丁玲、刘白羽等著名作家一同站上军艺的讲台。

一连五个上午的课,他声音清亮,讲唐诗宋词时能把意境拆解得让人心头一亮,聊小说创作时又能逗得学生笑出声。台下坐着的,有后来写《红高粱家族》的莫言,有写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的李存葆。

后来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孙绍振也没想起当年“培养世界冠军”的玩笑话。但2013年莫言来福清演讲那次,他至今记得很清楚——快70岁的他,挤不过往前凑的年轻人,幸亏有学生在第一排角落给了他个位置。莫言要开讲,按惯例该先提“尊敬的领导”,可莫言一眼就看见了他,开口第一句便是:“尊敬的孙绍振老师!”

演讲里,莫言特意感谢:“孙老师讲诗的那些日子,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孙老师对很多诗歌意境、诗意的分析,对我文学语言的改善、对我小说意境的营造,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。”最后握别时,莫言还特意说:“感谢栽培。”那会儿军艺每学期的学生民意测验,孙绍振的课总排在第一。

不光是莫言,后来作家宋学武照着他课

上讲的“心口误差”写小说,登上了《上海文学》;麦家在颁奖礼上拍他的肩膀道,“我是你的粉丝”;岳南送来自己写的《南渡北归》,扉页上写着“送给我的亲老师孙绍振教授”。这些作家们的认可,比任何奖项都让他开心:“能帮到他们动笔、写出好东西,才是真本事。”

以前总有人说“中文系不培养作家”,可孙绍振用实打实的结果打破了这个说法——不光有了能教创作的课,还走出了莫言这样的作家。他常说“自己不想当‘评论员’,更想做‘教练员’,‘就像体育比赛,虽然自己不一定能成为世界冠军,但能培养出众多世界冠军,才更有意义’”。毕竟“只有状元徒弟,没有状元师父”,看着学生比自己强,才是老师的骄傲。

如今90岁的他还在——忙着打磨《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矛盾和艺术生命的发展》,20多万字的稿子改了又改,要写到40多页。他说要凭着中国的文学文本,建立一套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,“一百多年了,该让世界听听我们的声音”。这件事,或许一代人做不完,但他愿意先迈开步子。

采访结束时,他笑呵呵地与我们告别,一改正经模样,仿佛“营业结束”。那一刻,他忽然不像学者,更像一个下课铃响后跑出教室的中学老师。

孙绍振(右二)在《说不尽的孙绍振》新书发布现场为读者签名。
本报记者 燕晓摄孙绍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。
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